

海外藏人的人类学研究： 围绕北美藏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评析

刘志扬

摘要：海外藏人社会研究是目前中国藏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而这部分恰恰是西方藏学人类学积淀最为丰厚、成果最为突出、影响力最为显著的方面。西方藏学博士论文折射出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藏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取向。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海外藏人的文化适应问题，结合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和移居国情境，讨论了海外藏人在文化适应方面所经历的张力：他们一方面或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和融入当地文化，另一方面仍试图以对传统文化的坚持来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立足于国内藏学研究对西方藏学研究的评介，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理念，增进国际间的学术对话；同时也旨在西方藏学研究框架之外分析其缺失和偏颇。

关键词：人类学；藏学；藏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海外藏人

海外藏人社会研究是目前中国藏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而这部分恰恰是西方藏学人类学积淀最为丰厚、成果最为突出、影响力最为显著的方面。借鉴和学习西方学术界对海外藏人社会的研究，可以为我国藏学界逐步展开海外藏人社会研究奠定资料的基础。为此，笔者选取了一些北美大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藏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就其对南亚和美国、加拿大藏人社区的研究做一简要的评介，以期扩大我国藏学研究的全球视野，增进国际间的学术对话。文中资料来自“PQDT博硕论文文摘库”和“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截止2012年1月，在PQDT博硕论文文摘库中能够检索到的，与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海外藏人社区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欧美博（硕）士学位论文有2611篇，其中藏学人类学博士论文80余篇。

一、印度、尼泊尔 藏人居住区的文化适应研究

从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藏族就开始在印度的大吉岭、噶伦堡、拉达克等地定居，这部分藏族逐渐被印度社会所接纳，成为当地少数民

族。1959年西藏叛乱后，一些藏人跟随达赖喇嘛辗转至印度及尼泊尔、不丹等国，成为没有国籍的难民。这些藏人一部分住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河谷和博卡拉，印度的德里、马苏里和达兰萨拉等城镇，其他大部分定居在西方民间组织帮助建立的农业和手工业定居区里。^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专门为1959年出走西藏的藏人建立的屯垦区不断增加，目前共有52个屯垦区分散在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南亚喜马拉雅诸国，其中印度35个，尼泊尔10个，不丹7个。^②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藏区以外的藏人总人口数为127935人，其中印度94203人，尼泊尔13514人，不丹1298人，散居在南亚以外其他地区18920人。^③

与早期定居并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的藏人不同的是，这批1959年才离开故乡来到南亚陌生国度的藏人，其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基本断裂了，他们不能适应这里与西藏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以及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而且他们大多是农民、牧民和小商贩，他们拥有的传统生产技能到了新的环境后基本没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语言不通等困难，因此面临着

作者简介：刘志扬，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① Yeh, T Emily, "Exile Meets Homeland: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Tibetan Diaspora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5, 2007, pp. 648 ~ 667.

② 潘美玲《印度流亡藏人的维生策略：以毛衣贸易为例》，载《“第一届两岸藏学研讨会”论文集》（会议文集印本），淡江大学西藏研究中心，2006年。

③ Thinley, Phurba, *Planning Commission Releases Report on Tibetan Demographic Survey*, 2010-04-12,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8666>.

严峻的生存考验。最初,他们的生存和居住成为印度、尼泊尔政府十分头疼的问题,他们开始时被安置在临时难民营。后来通过一些农业发展项目的带动,这批藏人慢慢掌握了农业生产技能并定居下来。^①到2009年,由于价值观念的转变、知识水平的提高、专业技能的掌握和全球化经济的需求,这批藏人的从业情况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的人数大大增多,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现在仅有8.1%的人口依然以农业生产为主。因此,研究这批藏人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以及生计模式的转变等问题就成为西方人类学者的一个关注焦点。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藏族学者乌金贡布(Gombo)的研究表明,到20世纪80年代,定居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的那些1959年出走西藏的藏人,已经基本能够适应当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所以能够较快适应,主要原因包括西方社会的物资援助以及尼泊尔政府对他们采取的相对宽松、自由的政策,还有就是他们抓住机遇经营一些非当地特色的行业和产品,如旅游业和藏毯生产。^②藏毯行业是在尼泊尔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新兴行业,仅仅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由那批藏人开办的一些小作坊便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东方手工地毯供应商,并超越旅游业成为尼泊尔出口赚汇的主要产业。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托马斯·奥聂尔(O'Neill, Thomas),运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社会资本的理论,对尼泊尔加德满都300多个藏毯企业进行了研究,其重点关注的就是藏毯企业中民族文化遗产,以及地缘、血缘关系对生产和管理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尼泊尔这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藏毯业对藏人延续自身文化、保持藏族身份所起到了重要作用。^③

内华达大学印度裔博士生叶赛·汪迪(Yosay Wangdi),在2001年1至12月间对印度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藏人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她围绕着“藏人是如何被定义”这个专题进行了深入

访谈,探讨了1959年出走西藏来到南亚地区的藏人群体中逐渐形成的新的身份认同的过程和模式,以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身份认同的变化情况。^④加拿大西蒙福瑞舍大学马蒂尔德·博纳白(Matilde Bernabei)的博士论文也是从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分析了1959年出走西藏进入印度的那批藏人中,在印度接受各种教育的年轻一代的文化适应问题,由于这些年轻藏人出生在境外,没有多少关于故乡的感性和直观认识,所以作者关注的是他们在传承传统文化和构建新的身份过程中的态度问题。^⑤

夏威夷大学的热穆·巴哈杜尔(Chhetri),调查了尼泊尔博卡拉地方(Pokhara)1959年出走西藏的那批藏人的文化适应过程。他的研究表明,为了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防止为寄居国主流文化所同化,那批藏人在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居住地不断构建自己的族群和文化边界。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根据具体的社会情境对“边界”加以灵活的调整,以更好地与当地居民相处。从他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身处异国他乡的那批藏人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当地文化的冲击,如一些人与当地人通婚并加入所在国国籍;还有的年轻人虽然崇信佛教,但并没有出家的愿望等问题。^⑥美国西北大学的海蒂·安(Heidi Ann Swank)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丹增多吉(Tenzin Dorjee)则从藏语码转换角度和方言的运用情况来研究1959年出走西藏的藏人在寄居国的文化适应。海蒂·安研究的是生活在印度北喜马拉雅邦上达兰萨拉青年藏人日常生活中的读写能力。她记述了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在3个藏人群体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流和共享的状况,以及他们通过语言保持各自象征性群体特色的方式。^⑦从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在印度达兰萨拉等1959年出走西藏的藏人聚居区,藏人为了适应环境,熟练地掌握了除藏语母语之外的1~3种语言,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地进行语码转换。

近年来,还有学者开始关注音乐、旅游、

①Goldstein, Melynn C., "Ethnogenesis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among Tibetan Refugees in South India: A New Face to the Indo-Tibetan Interface", in James Fisher (ed.), *Himalayan Anthropology*,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 1978, p. 396.

②Gombo, Ugen, *Tibetan Refugees in the Kathmandu Valley: A study in Socio-Cultur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and the Adaptation of a Population in Exil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Ph. D. dissertation, 1985.

③O'Neill, Thomas, *Carpets, Markets and Makers: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Tibeto-Nepalese Carpet Industry*,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Ph. D. dissertation, 1997.

④Wangdi, Yosay, *Echoes of an Agonized Nation: Transformations in Tibetan Identity in Diasporas*, United States - Nevada, Ph. D. dissertation, 2003.

⑤Bernabei, Matilde, "Born on Tongue": *Education, Identity and Agency of Tibetan Youth in the Indian Diaspora*,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1.

⑥Chhetri, Ram Bahadur, *Adaptation of Tibetan Refugees in Pokhara, Nepal: A Study on Persistence and Change*, University of Hawai'i, Ph. D. dissertation, 1990.

⑦Swank, Heidi Ann, *Spoken Tibetan, Written English: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Linguistic Marketplaces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of McLeod Ganj, Ind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6.

NGO组织和西方国家援助等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对境外藏人社区社会变迁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如华盛顿大学的彼得·凯文(Moran, Peter Kevin),以藏传佛教为主线,探讨了尼泊尔加德满都郊外博大哈大佛塔社区的藏人与西方旅游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他的研究我们知道,对于西方旅游者来说,“西藏”和“佛教”不仅仅是一个可用肉眼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更是通过学习佛法和修行融入于其中。^①米凯拉(Michaela Pichler)的论文《一个印度藏人社区中的变化与传承:噶丹曲林尼姑与社会变革》,通过对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尼姑寺噶丹曲林寺(Geden Choeling)内尼姑的观察和访谈,以一项旨在改善尼姑饮食结构的西方参与性援助项目为主线,探讨了全球化背景和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1959年出走西藏的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所形成的社区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特别是西方观念为主导的现代化与藏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适。^②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上出现了很多流亡的难民群体,很多难民群体在若干年后不可避免地被寄居国所同化和融合。即使是那些顽强保持着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群体,流亡生活依然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南亚诸国的海外藏人也无法逃避这一现实,为了适应飞速变化的周边环境,他们也在进行着各种改变。如宗教僧侣阶层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减弱,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再由出身和血统等世袭身份决定。同时,为了获取更多的西方社会同情和资金支持,他们在体制、观念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目前,尽管南亚藏人在经济上已经基本可以自立,但是他们还是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生活水平低下、就业渠道狭窄、发展前景渺茫等。另外,因为达赖集团阻止他们取得所在国国籍,因此他们在教育、求职就业、获得土地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限制。

二、藏人移居西方国家后的生活与“藏族认同”

目前,南亚国家以外的海外藏人分布在美

国、加拿大、瑞士、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瑞士和英国是欧洲接收藏人最多国家。另外,欧洲的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接受了少量的藏人定居。^③在欧洲之外,美国和加拿大则逐渐接纳了数量更多的藏人。据统计,1998年移居南亚以外的海外藏人为12 153人;到2009年,外移迁居南亚以外国家人口大幅增长,达18 920人。其中,1998年至2009年间有超过9 309的人口迁移到西方各国。^④这主要是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放宽了对藏人的移民限制,允许已经定居的藏人的亲属移民。藏人喜欢扎堆聚居在北美的大城市,如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目前,藏人最多的城市分别是多伦多(约3 500人)和纽约(约3 000人)。^⑤这样,大量移居欧美的藏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如何顺利地完文化的适应,以及如何保持藏族传统文化,成为欧美学者十分感兴趣的话题。

1971~1972年,加拿大从印度和尼泊尔接收首批228名藏人到该国定居。加拿大政府将他们安置在了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曼尼托巴省、亚伯达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卑诗省),安置原则是按照藏传佛教的不同派别分别居住(黄教信徒在安大略的林德赛、魁北克的蒙特利尔;红教信徒在曼尼托巴的温尼伯市;花教信徒在亚伯达省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莱斯布里奇)。藏人移居加拿大初期,由于语言不通,知识结构与职业技能有限,他们大多都在农场、牧场工作,不但工作劳累、生活环境不佳,而且每月收入也十分微薄。

10年之后,加拿大纽约大学的珍妮·麦克莱兰(Janet McLellan)对安大略省林德赛镇格鲁派藏族小社区进行了人类学调查,她关注的是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情境中,藏族的族群和宗教认同问题。从她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藏人从南亚移居林德赛之后,受到加拿大主流文化的强烈影响,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如社会地位、传统的职业、婚姻形式、家庭结构等)。虽然他们通过就业、受教育、做生意等方式已经开始融入加拿大社会,但是他们却仍然

^①Moran, Peter Kevin, *Buddhism Observed: Western Travelers, Tibetan Exiles, and the Culture of Dharma in Kathmandu*,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h. D. dissertation, 1998.

^②Michaela Pichl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in India: Social Reform and the Nuns of Geden Choeling*,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M. A. dissertation, 2000.

^③尹德《海外“流亡藏人”调查》,《国际先驱导报》2009年3月17日。

^④Thinley, Phurpu, *Planning Commission Releases Report on Tibetan Demographic Survey*, 2010-04-12,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8666>.

^⑤Loriggio, Paola, "At home in Little Tibet", *Toronto Star*, May 15, 2008.

强烈地保持着“藏族身份”。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情感已经延续到定居那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藏人。作者认为,藏人社区不仅仅是由家庭和友谊的纽带所维系,更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于相同的种族、历史背景、宗教信仰和共享的文化。珍妮·麦克莱兰这篇论文应该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研究南亚以外海外藏人社区的学位论文。

从2001至2006年,加拿大的藏族人口增长了两倍,他们大多是来自南亚的难民,也有一些是从美国迁居来的——因为在加拿大他们能够享受到比在美国更多的权利和福利待遇。目前,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等城市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中藏族移民较多的城市。因此他们在这里的活动也受到了较多关注。加拿大纽约大学的詹妮佛(Jennifer J. Logan)的调查点——多伦多南柏岱尔地区,在1996年以前并没有藏族居住,而现在已经有1700多藏人移民,他们大都是2000年以后才移居于此。多伦多是北美洲最大的一个藏人社区,有3500多藏人,其中一半以上的藏族居住在南柏岱尔地区。移居北美的藏人中的老一代逐渐逝去,绝大多数中青年藏人从未到过西藏,他们出生在印度,生长在加拿大或美国,对西藏的印象只是来自于父母或祖父母的记忆。因此,对海外藏人来说,“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詹妮佛的研究指出,这些低收入、文化程度不高的海外藏人如何在加拿大这个新的环境中重新建立起一个社会和物质空间的“家”,将是他们融入加拿大社会的关键。^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接受来自南亚的藏族移民,但真正成规模的接受是在90年代初期。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向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签发1000份移民签证。^②在《1990年移民法》通过后,藏人自南亚大举迁至美国。根据该法案第134章的藏人定居美国计划(简称TUSRIP),居住于南亚的1000名藏人被授予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这些人是依照各类别配额被选中的,包括给来自西藏的“新来者”(new arrivals)的100个名额。1996年开始采取抽签的办法,已被分配到18个州定居点的抽中

者,可以将他们的家人带到美国。^③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朱莉娅·梅瑞狄斯·赫斯(Julia Meredith Hess),对此次移民浪潮进行了实地田野调查,其论文叙述了移民北美后藏人在身份认同的表达上的转变策略,以及美国移民政策和其他政治经济政策对年轻一代藏人认同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突出说明了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同时,在保持藏族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困境。^④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艾米·莱文(Amy Lavine)以“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为分析概念研究散居于纽约的藏人。他认为,对故乡西藏的田园诗般的怀念和想象,成为海外藏人形成相对独立社区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的动力。因为藏族文化的故乡西藏不仅是他们祖先的故乡,更是宗教的圣地,这个集体的记忆是他们认同的基础。尽管海外藏人们认为,新的居住环境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他们还是在不断地调适和重构自己的文化。^⑤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皮特·格林·汉莱(Peter Glen Harle)选择了在他调查时仅有10年历史的美国明尼苏达州双子城的藏人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藏人在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和适应中生活的变迁。作者通过较长时期的参与观察和访谈发现,尽管藏文化传统在这个小小的藏人社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在与其他族群接触和互动的过程中,其传统的发扬不可避免地受到条件的制约,文化的完整性受到了挑战。出生在美国的年轻一代藏人接受了美国教育,在知识和文化上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祖辈父辈那样从事藏式餐饮和工艺品经营。因此,他们在与其他族群接触中,在心理、习俗、交流方式、服饰等方面都有了变化甚至呈现了与当地融合的趋势。^⑥

与那些1959年出走西藏到达南亚的藏人坚持其难民身份不同的是,移居北美的藏人急于取得所在国的国籍,成为美国或加拿大公民,他们

① Logan, Jennifer J.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A Snapshot of the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Newcomer Tibetan Women in Parkdale,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Canada), M. A. dissertation, 2010.

② 参见郭焕《海外“流亡藏人”调查》,《决策与信息》2009年第5期。

③ Yeh, Emily Ting, "Exile Meets Homeland: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5, 2007, pp. 648 ~ 667.

④ Hess, Julia Meredith, *Stateless Citizens: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Expanding Tibetan Diaspora*,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h. D. dissertation, 2003.

⑤ Lavine, Amy,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Social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Diaspora Tibetans in New York C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 D. dissertation, 2001.

⑥ Harle, Peter Glen, *Thinking with Things: Objects and Identity among Tibetans in the Twin Cities (Minnesota)*, Indiana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3.

移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改变其在南亚的窘困生活境况。他们到北美后,生存和发展空间大大扩展,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享受了很多福利待遇,因此,移民欧美的藏人在定居国的生活中,极力想适应和融入到当地文化之中。

从目前移民北美的藏人的情况来看,他们今后的走向取决于所在国的移民、政治和经济政策,以及如何在保持传统文化和融入主流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由于移居北美的藏人到达时间不长,他们的文化适应的努力必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对这些藏人的文化适应的考察还需假以时日,留待今后进一步考察研究。因为“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此过程中,他们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作为移民的文化特征。

三、讨论和小结

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学术界很少关注西藏和藏文化圈,鲜有成果面世,这一点最为直接地反映在美国、加拿大博士学位论文中。从1916年第一篇藏学博士论文问世到1959年,总共仅有10篇。^①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改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提供大量资金资助欧美大学的西藏研究,^②于是许多大学开设了有关藏文化和语言课程,自此之后,真正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藏学在西方才开始展开。

西方学术界对于藏族社会的研究有两个平行并立的传统。一是文本分析的传统,这是自19世纪末期开始,传教士开创的从梵文到藏传佛教经典研究的范式,文本研究最初关注于藏文文献的历史缘起,及其与梵文传统之间的关系,这种文本分析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传统是运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藏族文化和社会,其关注的对象是人和人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很少来中国从事田野工作。因此,印度北部的藏人社区就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西方学者也得以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藏族社会。许多学者,如阿齐兹(Barbara Aziz)、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艾娃·达尔嘉(Eva Dargay)、弗兰茨·

米切尔(Franz Michael)等,都是通过对1959年出走西藏到达南亚的藏人的访谈来重新建构西藏传统社会的典范。在一部分学者重建藏族传统社会的同时,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其中包括欧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开始在喜马拉雅诸国的说藏语人群的聚居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为传统藏族社会系统的比较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③西方藏学人类学对南亚藏人社区研究形成的深厚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目前,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除了宗教、仪式、社会结构等传统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外,还包括藏人社区的生存状况、文化适应和藏族身份的保持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藏人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移民人数的增多,北美藏人移民也成为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也导致西方社会对藏族、藏文化的关注愈来愈多,表现在学术方面,则是学术与现实问题、国际政治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美国藏学学位论文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是论文中表现出的偏离了学术研究本身的政治倾向性,因此,需要我们加以注意和甄别。如美国天普大学杜克斯(Kimberly Christine Dukes),其博士论文^④论述了电影、口头文学等叙述方式对于1959年出走的藏人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杜克斯提出的观点对以往固有的“民族”看法提出了挑战,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媒介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问题。但是他的访谈对象均为1959年出走西藏到印度的藏人定居点中有案底的人员,这样有选择性地挑选访谈对象,得出结论肯定有失偏颇,使得其论文的学术质量和价值减色不少。

西方藏学学位论文折射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藏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取向。对这些论文的评介,有助于我们扩大研究视野,增进国际间的学术对话,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更好地推进中国藏学人类学学术层次的提升。

(责任编辑 洪颖)

①刘志扬《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

②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资助成立了9个藏学研究中心。参见李若虹《美国藏学家金·思密斯及其新书简介》,《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

③Shakya, Tsering,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ibetan Studies", in Robert Barnett (ed.),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4, p. 1.

④Dukes, Kimberly Christine,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the Tibetan Exile: Movies, Media, and Personal Stories*, Templ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6.